

中国体育

体育强国的辨析与建设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文集

中国体育：体育强国的辨析与建设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体育:体育强国的辨析与建设/中国科协学会
学术部编.—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10

(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文集;28)

ISBN 978 - 7 - 5046 - 4992 - 8

I . 中… II . 中… III . 体育事业 - 研究 - 中国
IV . G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1577 号

本社图书贴有防伪标志,未贴为盗版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010 - 62103177 传真:010 - 62183872

<http://www.kjpbooks.com.cn>

科学普及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8.375 字数:200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18.00 元

主 编：冯长根
总 策 划：沈爱民 杨文志
专题主持：田麦久
策 划：刘兴平 赵崇海

科学的本质是批判，交流的本质是质疑。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系列活动旨在充分发挥学术交流作为原始创新的源头之一的作用，弘扬“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倡导自由探究，鼓励学术争鸣，活跃学术氛围，为科学家萌芽时期尚未获得主流认可的学术观点、理论以及灵感提供交流平台。该活动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举办。

倡导自由探究

鼓励学术争鸣

活跃学术氛围

促进原始创新

2018.12.17

序

体育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个充满活力的构成元素。一般来说，它与人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似乎没有直接的密切联系，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会发现，并且会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体育是如此地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幼儿园的孩子喜欢玩球戏水，写字楼的青年人热衷于瑜伽跳操；邻居退休的大妈是公园晨练的常客，李宁牌的运动衫是给孩子最好的生日礼物；刘翔、姚明、郭晶晶、邓亚萍的名字，在中国的南北西东，几乎是无人不晓；每逢精彩赛事，电视屏幕前，球迷们更是随着比赛的起伏时而欢呼、时而叹惜。体育就是这样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近代中国艰难的发展历程，中国的体育也迈出了自己坚定的步伐。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体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众的体质明显增强，竞技运动水平大幅度提升。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进入 21 世纪，中国运动员连续在 3 届奥运会的金牌榜上名列三甲，2008 年在北京奥运会上更是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以 51 个冠军的辉煌战绩迈上了金牌榜之首。国人为之欢呼，世界为之瞩目。

站在这样一个新的起点，中国体育应该如何持续发展？在 2008 年 9 月 29 日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出了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号召。这是一个宏伟的奋斗目标，也是一个新的科学命题。

如何为中国体育的发展现状定位？体育强国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差距？应该如何去建设体育强国？国家发展的战略设计者在思考，中国的体育界在思考，关心体育的人们在思考。

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承办的中国体育：体育强国的辨析与建设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于 2009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沙龙讨论的内容为：体育强国的定义、特征与评价标准；中国体育发展现状的定位：成就与差

距;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体系及发展策略。

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体育管理部门以及新闻媒体共 16 个单位的 21 位学者应邀出席本届沙龙,分别就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强国的特征、作用和建设等问题作了主题发言,并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沙龙宽松、真诚的学术氛围引发了学者们活跃的思维,讨论发言达 130 余人次,在学术思想彼此启发、相互碰撞的过程中,激发出许多新的认识、新的理解,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新观点、新理论。

与会学者的主题发言和讨论涉及到众多的学术问题。例如:

——关于体育强国与强国体育,体育强国与体育大国,体育强国与体育文化,体育强国与体育国际影响力的关系与区别;

——关于体育强国的基本特征、建设策略与评价指标;

——关于健身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教育体育的协调发展;

——关于职业体育和体育产业;

——关于我国竞技体育的持续发展,竞技体育与教育的融合,竞技体育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作用;

——关于我国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继承、批判与发展等。

体育强国建设是一个宏伟而艰巨的奋斗目标,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认识还远未完善,关于体育强国问题的研讨还有待深入,本期沙龙是这一认识过程中的一次有益的探索。我们希望,并且相信,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定会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向前。

在文集出版之际,作为本期沙龙的领衔科学家,我愿借此机会衷心地感谢各位学者的积极参与,感谢中国科协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关注和支持,感谢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办公室为沙龙的成功召开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田麦久

2009 年 7 月

目 录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历程的回顾与体育强国建设	金 汗(2)
文化体育,和谐体育当是强国体育发展的形象与旗帜	沈望舒(10)
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面临拐点	郝 勤(16)
“两个计划”面临的挑战——迈向体育强国道路上的战略难题	孙大光(24)
体育强国的辩证认识论	田雨普(33)
体育强国建设需改革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	黄亚玲(37)
迈向体育强国的中国体育产业——新理念、新阶段、新目标	杨 越(42)
体育强国的国际影响力	任 海(52)
体育强国的建设需要丰厚的体育文化土壤	崔乐泉(57)
更好地发挥竞技体育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与辐射功能	田麦久(62)
关于“体育强国”的几点认识	熊晓正(71)
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制度成本	卢元镇(76)

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向教育的回归	徐济成(78)
探索新时期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谭 华(81)
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体育强国	姚颂平(85)
体育强国的五个重要标志	常建平(87)
体育强国建设与中国三大球的发展	李元伟(89)
建设我们自己的体育文化	许立群(99)
历程·动因·理念:建设“体育强国”的思考	易剑东(102)
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转变与新时期的举国体育体制	胡光宇(104)
推动体育发展的模式转型	鲍明晓(108)
专家简介	(113)
部分媒体报道	(124)



会议时间

2009年5月27~28日

会议地点

体育总局科研所

主持人

田麦久

田麦久：

这次沙龙人员的组成是有特点的，有许多在体育界多年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还有体育界有关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同时也邀请了体育界之外，即工作单位的门类不在体育界，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内容都和体育有密切联系的专家。本次沙龙的题目是“中国体育：体育强国的辨析与建设”。胡锦涛总书记在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要推进和努力实践我们国家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进程，在体育界引起强烈反响，人们都在思考和研究什么是“体育强国”，我们现在和“体育强国”有什么差距，怎样努力才能够更好地建设“体育强国”。所以我们选择这样一个主题，而且在专家的邀请上，既有体育界内部的专家，还有多学科，包括社会科学、哲学、管理学、新闻学，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来参与这次学术沙龙。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历程的回顾与体育强国建设

◎金 汕

首先讲中国为什么重视竞技体育，中国是如何从饱受凌辱的国家变成体育大国的，再讲目前中国为什么还不是“体育强国”。

中国用竞技体育展现自身的精神的确取得了非凡的效益。从 19 世纪中叶起，中国饱尝了列强的凌辱。回想 1932 年刘长春独自出现在奥运赛场，想起新中国成立前数次参加奥运会颗粒无收，想起西方列强轻蔑地把中国人称为“东亚病夫”，想起中国参加奥运会被画成一群中国人打不破大鸭蛋的漫画，再想起那些用政治干涉体育、把中国排除在国际体育大家庭之外的粗暴做法，能够直截了当地尽快做出反击的是什么？就是亿万人关注的运动场。你不是说我们“东亚病夫”吗？那就到运动场看看中国人。你不是说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那就拿出金牌用实力来说话。你不是让中国人与世界体育隔绝吗？我们优异的成绩总有一天会让你们把我们请回来。

这里展示的图片（略）反映了旧中国生活的状况。那个时候中国参加奥运会，跑在最后一名的刘长春，由于 22 天的漂流，体力等各方面受到损耗，在领先一半后被人家甩在后面。

第二张图片（略）是 1936 年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参加几十个人，但是成绩是非常令人心酸的。

另一张图片（略）是柏林奥运会上唯一取得复赛资格的撑竿跳高运动员符保卢，他是一名优秀运动员，还是一名大学生，同时是一名电影演员，1.86 米，身材高大，前途在向他招手。但是在参加 1936 年奥运会之后，1937 年战争爆



发，他作为一名空军死在战场上。在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中，有好几个人是用自己的身躯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有三个拳击运动员走上战场，其中一个死在台儿庄战役，还有一个死得最惨烈，他抱着一包手榴弹扑向日军的坦克，在日军的坦克下粉身碎骨。作为民族英雄，都是应该纪念的。

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之后，突然感觉到中国体育如此之差。贺龙担任体委领导后，率领一个体育代表团考察研究苏联体育，感到举国体制是最好的体制，因为实施举国体制的苏联 1952 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便取得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成绩。贺龙同志回国以后，在竞技体育上用不长的时间构筑了一个极为完善的体育组织，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在亚洲的成绩就是第一了。到了 1965 年，我们的乒乓球在亚洲可以说是占据很大的优势，篮球、羽毛球、游泳、田径的成绩也有很大提高。当时陈家全百米十秒平过世界纪录；1956 年举重运动员陈镜开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第一个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的郑凤荣；还有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第一个女子乒乓球世界冠军邱钟惠、三届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等等。

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体育举国体制完全被摧毁了，而且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也突然间就变得很糟。1978 年改革开放，中国的 GDP 在全世界排在第十名，甚至落后于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和只有几百万人口的荷兰；改革开放几年以后，1984 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出现在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场的时候给人们带来全新的面貌。这个图片（略）是第一个奥运会冠军许海峰。

这些图片（略）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对比 1932 年孤苦伶仃一个人到了奥运会的刘长春，再看看 2008 年的鸟巢，突然感觉到这支运动队不仅是一个强大的运动队，而且感到身后的国家已经变成什么样的国家。

从 1932 ~ 2008 年的 70 多年时间，中国奥运会金牌从零到雄踞第一，期间走过了怎样辛酸、艰难、奋发、飞跃的征程。如今那些曾经看不起中国的强国，不得不用一种不解、钦佩的眼光看待昔日的弱者。

尽管一些国家对中国竞技体育的惊人成绩有些狐疑和醋意，但中国不会以冷战时代的思维面对，在 2008 年奥运会上，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大度与包容。



人们把 2008 年奥运会作为国家的成年礼，感染了多少曾经并不了解中国人的人。罗格在北京奥运会成功之后说，中国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人民来说有一点神秘，北京奥运会可以让全世界各国人民看到一个非常出色的国家，看到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这会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讲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体育确实远远超越了体育本身。

有几项几乎是人类难以想象的纪录，像博尔特、菲尔普斯，都是在北京奥运会上产生的。同时，中国运动员大踏步走向世界，其中不仅有他们出色的成绩，而且有商业社会的成功运作，姚明已经成为世界收入排名前十位的运动员。我们也可以看到，奥运会上中国体育还表现在它的经济辐射力，李宁赞助瑞典，康踏赞助立陶宛，露友赞助塔吉克斯坦，特步赞助白俄罗斯，匹克赞助伊拉克，李宁赞助西班牙，鸿星赞助朝鲜，这都是中国体育大国的标志。

我们特别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表彰大会上说，中国要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中国目前还不是体育强国，体育强国是我们的目标。

第一，表现在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含金量的差距，多数项目都是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这些成绩非常了不起，但是确实有一个共同的比较致命的弱点，就是商业价值不高，以至乒乓球、羽毛球得了冠军之后，我们会想如何保存这个冠军在奥运会上的存在。

第二，我们同时比较一下解体前的苏联，苏联是最早搞举国体制的，但是 1988 年汉城奥运会上金牌含金量大不一样，它作为一个客场的国家拿了 55 块金牌，那一届拿到男子足球、男子篮球、女子篮球、女子排球金牌，还有不少田径、游泳金牌，因此从金牌数来说，虽然只比咱们多了四块，含金量还是不一样的。另外还表现在体育产业上的差距，包括体育环境上的差距。奥运会以前，各个奥运会举办城市的人均体育场地为：洛杉矶 18.39 平方米，汉城是 11.35，北京是 2.33，上海 1.98。

第三，中国在体育产业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目前全球体育产业年产值高达 5000 多亿美元，美国超过 2000 亿美元。到 2005 年，我们体育产业总体规模最乐观的估计也只占 GDP 比重的 0.702%，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都在 2% 以



上，即使是巴西、印度等国家也超过了 1%。不知道这两年我们是不是略微涨了一点。

第四，我们在体育创业产业上的差距也很大。我国的冠军虽然很多，但是很多冠军是要用大量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以美国 NBA 为例，20 世纪 60 年代还要白白把比赛票送到观众家里扩大影响，是风雨飘摇的产业。但是依靠商业运作，渐渐有了赢利。当大卫·斯特恩在 1984 年成为 NBA 总裁的时候，整个 NBA 全年的收入也只有 1.92 亿美元。斯特恩一靠黑白双雄和乔丹的英雄时代，二靠强大的全球电视推广模式，用了 10 年时间，把 NBA 年收入变成 25 亿美元，最近几年，NBA 的年收入达到 30 亿美元！NBA 对多种产业的影响力以及推广美国文化方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美国跑步、游泳人口都达到几千万，我们与之差距相当大，而且这些体育活动极大地刺激了旅游、航空、餐饮、住宿，形成了多条产业链的能动效应。

第五，我国体育服务业尤其健身娱乐业占体育产业的比例太低。西方发达国家体育服务业占体育产业的比重均超过 60%，而我国体育产业相对发达的广东省和浙江省体育服务业占体育产业的比重分别仅为 23% 和 14.87%，我们的体育产业更多的是来自于体育用品制造这个第二产业，与国外依靠创意和体育服务带来高附加值的情况完全不同。

前几年的数据表明，60% 的家庭体育消费在 100 元以下。北京人每天闲暇时间是 6 小时，但是 90% 以上的人说，可以锻炼，可以走步，但是不花钱。十年来体育场地的建设取得显著的成绩，但是设施质量不好，每万人仅拥有 6.58 个体育场，这应该是全民健身的瓶颈。

第六，体育产业领域，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的投入是失衡的，以政府资金投入为主造成的政企不分的弊端必须改变。以体育场为例，全国 81 万多个体育场当中，国有经济有 64.4 万个，集体经济有 12.6 万个，由于民营资本不能大规模地介入，也影响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

另外，根据《2005 年中国文化产业报告》调查得出，80% 的人不去体育场观看比赛，在 21 座城市里，只有 8 座城市的数据超过 10%。北京为 11%，上



海为 15.3%，广州仅为 5.4%。中国最近 20 年同样出现了富裕阶层的兴起，中产阶级增多了，球迷膨胀了，假期长了，大学生成倍增加。但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运动偏少并且始终不能把体育产业做大呢？这与我们把最大的精力放在被视为形象窗口的竞技体育上有很大关系。

教育部体育司负责人周士君 2006 年 8 月份透露，从 1985 年开始，中国进行 4 次全国青少年健康调查显示，20 年来中国青少年的体质持续下降；眼睛近视，初中生接近六成，高中生八成，大学生高达八成三。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上捷报频繁，奥运金牌直线飙升。为何青少年的体质却持续下降？健康是基本人权，达到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性指标——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论述。

我们不得不指出，举国体制未必是最合理的体制，体育界提出所谓为其他国家所学习和效仿也未必是真实的，学习和仿效是有的，但毕竟没有成为主流。同时金牌战略也要讲究成本，1988 年汉城奥运会上，1670 万人口的民主德国居然取得 102 块奖牌，其中金牌高达 37 枚；而中国对金牌的投入，是民主德国的很多倍，从投入产出角度来说，中国举国体制不能说是完美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地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财政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投入也要增大。在特定历史时期，体育曾经担负了过多的职能，尽管金牌让国人兴奋和鼓舞，但也占据了惊人的财政资源，影响了民众体育。对于一个追求和谐的国家，有更多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至少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给体育主管部门减负，强化大众体育建设，让体育更多地造福于民。

沈望舒：

对金汕先生的举国体制，或者是举国体育提点看法。我个人认为举国体制有特定的含义，按照金先生所介绍的，我们曾经有过自己非常灿烂的一段历史，这个举国主要讲的是我们有非常广泛的参加体育运动的国民人群，而不是仅仅指我们现在理解的使用国家配置经济技术资源的能力，用现在特别时髦的一个



词“打造”而形成的单纯物质资源汇聚机制。当所有的资源离开了国民的发展，离开了体育真正的建设，而变成扭曲体育、丑恶体育、病态体育的时候，那么这个“举国”就是应该被批判的。

如果我们回到真正文化层面的体育，某一个项目、某一个体育业态有非常广泛的国民基础，这种举国则是我们梦寐以求，同时是我们理想的境界。所以，当“举国”还有一定正面意义、保持一定方面的优势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它提高到文化的层面，把举国变成真正的举国。

谭 华：

更正一下，1952年贺龙没去赫尔辛基，他到国家体委是1952年底的事情，赫尔辛基奥运会是7月份。当时两个报告也不是贺龙写的，是教育部和团中央写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这两个报告都建议请贺龙任中国体委主任。

有两点我想谈谈我的看法。第一，关于中国是不是要用纳税人的钱养狼的问题，《人民日报》及其他一些媒体的记者已经发表了有几篇文章，中心论点是“NBA不是自个儿搞得挺好吗？我们自个儿搞就行了”。但是这些文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乒乓球、羽毛球如果没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拿金牌，不知道我们自个儿能不能玩起来？NBA本来就是一个国内赛事，这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现在有体育实力，也有经济实力，对人类社会体育的平衡发展、均衡发展，应该有自己的贡献。

第二，关于举国体制，很多的同志一直坚持说举国体制好。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几点想说明：

(1)举国体制已经偏离了原始含义，现在各方面对举国体制的理解并不一致，这是没有办法深入讨论下去的。

(2)现在举国体制并不是举国，只是举了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的资源。比如清华大学跳水队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他们有能力做一些事情，但是某些部门坚决拒绝它。所以，我认为现在不是真正的举国体制，只是举国家体育总局直接管理下的体育资源。换句话说，体育总局在很多方面代表的只是总局管的体



育，而不是整个国家的体育。

熊晓正：

首先，举国体制并不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了，今天讲的举国体制主要是指竞技体育赶超发展的体制。不论是在肯定者还是批判者的讨论中，实际上大多是围绕我们发展竞技体育的这个体制，即“举国体制”。我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时候，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体育发展战略，所有运动员都是从群众体育活动当中涌现和产生的。第一届全运会的时候，参加全运会的运动员是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实际存在的发展模式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举国体制”。实际上“举国体制”的雏形出现在 60 年代。60 年代，原国家体委在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采取了“缩短战线、保障重点”的发展战略。正是在这样一个战略发展基础上，我们构建为现在称之为“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这说明我们一开始并没有采取“举国体制”。

第二，“举国体制”是我们在投入与需求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为实现赶超而选择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对于“举国体制”的认识和评价，不应该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应该充分根据举国体制在我国竞技体育赶超发展当中的历史作用做出相应的判断。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向体育大国发展，就必须采取超常规的发展战略。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起，我们就确立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目标。赶超的发展战略是在需求和投入的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确定下来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去把所有的东西全面展开，只能够采取缩短战线、保障重点的发展策略，通过重点突破带动我们的发展。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选择竞技体育赶超发展战略，应该是正确的，是符合我们国情的。而且实践证明，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我们今天称之为“举国体制”的发展模式，对于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体制保证。我认为对举国体制的历史功绩应该充分肯定。

第三，再好的体制，历史上发挥很好作用的体制，是不是永远适用的体制，